

# 小家碧玉

李宽定



# 小家碧玉

李宽定

\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9.4375印张 6插页 225千字

1984年1月第1版

1984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2,880

书号：10173·504 定价：1.20元



李 竟 定

## 作者介绍

李宽定，男，37岁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贵州省桐梓县人，出身于一个教员的家里。在乡村里渡过了童年，后随当小学教员的姐姐到县城里读书。1962年考入遵义师范学校，毕业后在家乡的中学和师范学校任教十多年。1975年开始创作并发表作品，曾发表过短篇小说《山妖》、《乡民》、《野渡》等二十余篇；中篇小说《爱的价值》、《良家妇女》、《小家碧玉》等五部。1979年调贵州省《山花》编辑部作编辑工作，1982年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习。这个集子里所收入的，是作者在文学讲习所学习期间发表的部分作品。

## 出版说明

一、举凡在事业上取得卓绝成绩的人，不管他们是科学家、艺术家还是作家，都有平凡而又感人的、至关重要的第一步，我们编辑出版文学新人第一本单人集丛书，就是为他们的第一步做些有益的工作。

二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文学新人争相破土而出，他们以新的姿态、新的气魄、新的内容和自己独特新颖的艺术风格，出现在读者面前，崛起在文坛之上，真是人材济济，硕果累累。为他们编辑出版一套第一本单人集丛书，不仅是搜集他们的丰富成果，繁荣文艺创作，促进文学新人的成长，而且也是为了给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学发展时期，留下它的历史纪录。

三、我们将有计划地、分期分批地、不断地编辑出版这一套文学丛书，凡在本刊选载过作品的文学新人，都在编选之列。

四、文学新人第一本集子，以作者的中篇小说为主，适当选收一些较为优秀的短篇小说和其他文艺作品。集子前头，刊有作者近照和作者简介；集子后头，有作者后记或附记，介绍作者的创作感受和成长过程，为文学爱好者提供借鉴和经验。

《中篇小说选刊》编辑部

## 目 录

爱的价值.....	( 1 )
小家碧玉.....	( 90 )
良家妇女.....	(216)
后 记.....	(295)

# 爱的价值

## 一 人死不能复生

人生得一知己足矣

——鲁迅

刚刚走进食堂，值班的小陈追上来喊老严去接电话。我把饭舀好等他，可是，他一去就不来了。什么电话要打这么长的时间呢？我的肚子早就饿了，就先吃了，边吃边等他。直到我吃完了饭，食堂里吃饭的人都走光了，他才急匆匆地走进来，先抓起了两个馒头，才对我说：

“县里打来的电话，我爱人的姐姐病危，我得回去一趟。”

这时，我才注意到他已经换了衣服。我忙说：“吃了饭再说。”

“来不及了，我现在去还赶得上火车。”

他边说，边往外走，边把馒头塞进手提包里。我赶忙站起来追上去，问他：

“什么病？这么急，明天早上走不行？”

他没有回答我的问话，却说道：

“六十四章我已经改完了，放在你的桌子上。你先看看，还不行，我回来再改。”

我问他：“你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她病了半年多，我还一点儿都不知道。”他说，“……我先去看看，明天下午我打电话来告诉你。”

从红山招待所到火车站，十八里路，末班公共汽车，在我们

吃饭的时候就开走了。我说：

“我送你吧。”

“算了，不要送了，等会儿你一个人回来。”

“我就不回来了。明天你打电话，打到出版社。稍等一下，我把稿子收起就来。”

“快一点儿，”他看了下表，有些焦躁地说。

我和严冬民是七九年在省文代会上认识的。我们一个讨论组，讨论的地点就在他住的那个房间。房间小，人多，每到讨论的时间，他就脱了鞋坐到床上去。别人发言的时候，他总是用拇指和食指摩挲着刮得很光的下巴，不时看看发言的人，很注意地听着。他坐在我的对面。不知道是不是他穿的那套半新不旧的灰制服，风纪扣又随时都扣着的缘故，我总以为他是个中学教师。

我们那个组里，有一个很“革命”同志。后来，我才听人说他是个县文化局新提拔的副局长。每一个人发言之后，他都要评论一通，这使得大家心里都很不舒服。后来，他离开了讨论题目，批评我们出版社出版的一个短篇小说集，他说集子里有一篇作品的问题很严重，是提倡性解放的。老严那不停摩挲着下巴的手指，突然停了下来，很随和地插了一句：“这位同志说的‘性解放’，含义是什么？”那位批评家倒是挺爽快的，他说：“一拥抱，二接吻，三上床。”老严拖长了声音，先“哦——”了一声，然后又开始摩挲起下巴来，那种神情，看不出他是若有所思呢，还是不以为然。后来，他又插了一句：“这位同志刚才批评的提倡‘性解放’，是指哪一篇作品呢？”他说得仍旧很随和。那位批评家立刻指出作品来，（恕我就不把这作品的名字说出来了。）并且上纲上线的批判了一通。我听着，真是啼笑皆非。但因为我是那本集子的责任编辑，不好说什么，只是很委婉地作了一些解释，并且简单地介绍了一下那篇作品的作者的情况。作者是个十



八岁的女工。谁知那位仁兄不等我的话说完，竟抢着忿忿地说道：

“一个十八岁的女青年，去描写夫妻生活，写得这么细腻，这么逼真，我简直怀疑，没有体验过，……现在的年轻人啦！”

这一下，我真的动肝火了，正要反驳他，老严的拇指和食指一下张开，卡住下巴，目光炯炯地看着那位副局长，说道：

“这就和鲁迅先生说的那样了：要写强盗，就得先去杀人放火；要写妓女，就得先去卖淫。这位同志是在进行文艺批评，还是在骂大街？”

老严的话，声音不高，却很严厉；特别是最后那句话，问得很尖锐，很有份量。我问身边的一个同志，才知道这个“中学教师”就是严冬民，是个县委书记。在这以前，我读过他发表的几个短篇，写得蛮好的，很有功力。从这以后，我和他单独接触过好几次，印象也是蛮好的。他在讨论时的几次发言，那种和朋友聊天一样的语调，和那些精辟独到的见解，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象老严这样的县委书记，省外怎么样，这我不敢说；在省内，很难找！别说县委书记了，就是在一般科局长里面，关心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参考消息》的倒是不少；茶余饭后，躺在沙发里看看《三国演义》、《儿女英雄传》的也有；但象他这样认真阅读过大量的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、读读文学史、哲学著作、别林斯基的文学评论，并且做笔记的，有几个呢？反正，我还没有听说有哪一个县委书记，写出过一百一十万字的长卷，而且写得这样好的。坦白地说，作为这三卷长篇小说的责任编辑，是我自己主动争取来的。

我喜欢他的这部作品，更尊敬他这个人。

在去火车站的路上，我问老严：“你爱人的姐姐得了什么病？”

“电话是辛副书记打来的。他没有说是是什么病，只是说她病危，叫我马上赶回去。看样子病得一定不轻。”老严说得很忧郁。

我问他：“你爱人的姐姐在县里搞什么工作？”

“妇联主任。”

“也是西进时到贵州来的？”

“我们一起来的。解放初我当区委书记时，她就是我那个区的妇联主任。五三年冬天我调到县委宣传部，五四年春天她就调到县妇联。五九年冬天县里抽一批干部加强区社的领导，本来没有抽到她，因为她三番五次的要求，才让她下去当了几年区委书记。结果把身体拖坏了，脚也摔坏了，六六年春天才又调回县妇联。文化革命当中，我这部书的初稿，不是她给我保存起来，到现在恐怕连灰都找不到了。”

“她也是江西人？”我问。

“是的，我们是同乡。我们两家门对门，中间只隔一条马路。我昨天下午给你说我打算写的那个中篇，写的就是她的一些事情，说是中篇报告文学也行。”

昨天晚饭后，我们出来散步，老严给我说他这个长篇脱手之后，马上就动手写一个友谊题材的中篇。我刚问他的构思，几个业余作者来访，就把话岔开了。

我问他：“已经构思好了？”

“这些事情都是我亲身经历的，有的已经相隔好长时间了，但当时的情景，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，而且一想起这些事情心里就很激动，不写出来总象欠着一笔债一样。”说到这里，老严调过脸来，对我笑了一下，笑得很忧郁。他说：“也真有意思，我这一生当中，每一次感到很困难的时候，我这姐姐就向我伸出了手。她好象真有什么‘奇异功能’一样，能遥感到我的心理活动。……”

“你说来听听。”我忍不住笑了，说道。

“几十年中的事情，哪里说得完？”

“你挑几件说吧，反正是走路。”

老严沉默了一会儿，才说道：

“好吧。”

“我爱人叫曲玉丹，她叫曲玉芝。你说巧不巧？我和曲玉芝不但同年同月同一天，而且是同一个时辰生的，都是子时出生的。那时，虽然岳父和我父亲都是教书的，但是家里连个小闹钟都没有，更不要说手表了。到底是她先出生，还是我先出生，仅仅是个估计。那是我们出生的第二天，岳父在去学校上课的路上说起这事，说她刚生下来鸡就叫了，问我父亲我是什么时候生的。我父亲说不清楚，放学回来问我母亲，母亲说她疼痛得最厉害的时候，好象听到过鸡叫。这就是说，我是鸡叫后才出生的了。就根据几声鸡叫，她就长我了，成我姐姐了。

“我们杨花镇，就在军山湖边上。那是个很繁华的小场镇，我们那里叫‘圩’；赶圩，贵州人叫赶场。我们住在靠湖边的一条背街，街不宽，石板铺的，很幽静。我们家门口有一棵很大的柳树，树枝伸到街那边的房子上去了。到了夏天，这柳树象把大伞。岳母在柳树底下放一张苇席，我和曲玉芝就在席子上玩，玩累了就在席子上睡。两个母亲轮流守在席子边，空出一个人去做事。我吃过我岳母的奶，玉芝也吃过我母亲的奶。我岳母也姓罗，娘家也是在高祥镇，和我母亲好得象亲姊妹一样。所以，我和曲玉芝从小就以表姐弟相称。

“第三年，席子上又多了个玉丹，可热闹了！”

“以后长大了，上学读书了，我们放学回来，就把吃饭的小方桌抬到柳树底下去，写字，做算术。两家的父亲又轮流守在桌子边指点。我父亲教算术，岳父教语文，——那时叫国文，他的国文很好。两个老人同在一个学校教书，很合得来，算得是深交

了。

“我们就这样耳鬓厮磨了十八九年，称得起青梅竹马了吧？单这段时间里，可写的东西就很多了。

“我说个小细节你听吧。

“我爱人小的时候很滑头。有一回，她母亲给了她三个饼，叫她分给玉芝和我一人一个。她在路上偷偷地吃掉了一个，拿两个来分给我们。我们吃，她就在旁边歪着脑壳看，问她吃过了没有，她不说吃过了，也不说没有吃过，却反过来问我：‘冬哥，饼子好吃不好吃？’玉芝把饼递给她，她不要。——她怕玉芝回家给她母亲说。我把饼给她，她接过饼就吃，吃了还要问我：‘冬哥，你不爱吃饼啊？’玉芝把她的一个饼又分一半给我。我和玉芝两个人分一个，玉丹一个人吃两个。过后，大人问起来，玉丹还有话说：‘我没有伸手要，冬哥自己给我的，他不爱吃饼嘛，不信，去问。……真有意思！’

“我父亲死的时候，我才十岁。我小学毕业的那一年，母亲也病死了。母亲死的时候，我刚满十五岁。因为我病了耽搁了两年，比玉芝矮了两级。她已经读中学二年级了。

“母亲死的那天晚上，我和玉丹请医生去了。等我们把医生请来，母亲已经死了。我成了孤儿。岳母收养了我。我在岳母家里住了半年，考上了师范学校，到南昌读书去了；但寒暑假回来，仍是住在岳母家，直到我和玉丹结了婚，才离开了她们家。

“我再给你说一个细节。——这都是真的，没有任何加工。

“为了供我和玉丹上学，——啊，我忘了给你说，我父亲去世的第三年，岳父也死了。为了供我和玉丹上学，玉芝中学还没有毕业就退学了。玉芝退学，事先我一点儿也不知道，等我放学回来，她已经到洗衣店当女工去了。我在湖边找到她的时候，她正跪在条石上，一边用槌衣棒捶打着条石上的衣服，一边抽泣，

但当她调过脸来看见我的时候，却装出一副笑脸来，故作轻松地问我：

“‘就放学了？你们今天上的是什么课？你们发算术卷子没有？’

“这怎么遮掩得过去呢？她的眼睛都哭肿了。

“那天，我哭了。她故意用手刮着脸羞我，说：‘好羞！这么大的人了还兴哭哇？……’但话还没有说完，她自己也哭了。我们坐在湖边那棵杨槐树下。那天的情景，我们说的话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因为我们班上有个同学，刚刚退了学到铁匠铺去当学徒，我给玉芝说，我也要退学到铁匠铺去当学徒。玉芝不准我退学，——你猜她怎么劝我？她折下一根树枝，在面前的泥地上写了整整齐齐的一长排加法算式。

$$0 + 10 = 10$$

$$1 + 9 = 10$$

$$2 + 8 = 10$$

$$3 + 7 = 10$$

$$4 + 6 = 10$$

$$5 + 5 = 10$$

$$6 + 4 = 10$$

$$7 + 3 = 10$$

$$8 + 2 = 10$$

$$9 + 1 = 10$$

$$10 + 0 = 10$$

“‘冬冬，’玉芝一直是这么叫我，‘你看，这个加数从0上升到10，那个加数就得从10下降到0，和呢，都是10。一家人

也是这样的。这个人多占一点儿，那个人就少得一点儿；这个人少占一点儿，那个人就多得一点儿。冬冬，我们家穷，顾不全了。你不要三心二意的，你要好好地读书，我和妈妈做工挣钱来供你们。只要你能占10，我就占0，也喜欢。’”

老严说到这里，激动得声音都颤栗起来了。他沉默了。我也因为被曲玉芝这种牺牲自己、成全别人的情操所感动，在心中想象着她的形象，也沉默着。我们就这样沉默着走了好长一段路。

老严点起一支烟，才接着说了下去。

“她这个人，为别人想得很多。我举个例子你听。

“她很俭省。平时关起门来吃饭，一碗白菜，一碟辣椒，给小孩炒个鸡蛋。可是，家里来了客人，她就七碗八盘地往桌子上端。有点儿什么好吃的，她就留着招待人。五五年我出差去北京，带了只北京烤鸭回来，送了她一只。我们家的那一只，当天就报销了，玉丹还埋怨我不多带两只回来。她的那一只，挂起来舍不得吃，来了客人才去割一半，剩下的那一半又照样挂好。隔了好久，有一天我们饭后闲聊，不知道怎么又扯到北京烤鸭。我问她味道怎么样，她说：“十多块钱一只，味道还会不好吗？麻乎乎的。”什么‘麻乎乎的’！她以为北京烤鸭也和本地卖的那种五香卤鸭一样。一只鸭子完了，她自己连什么味道都不知道！”

“她就是这么一个人。

“有一次，客人走了以后，她的小孩说了这么一句话：‘我好想天天都有客人来哟！’说得我们大家都笑了。但一阵笑过之后，心里又总感到不是个滋味儿。——也真有意思，只要她买了点儿什么好吃的东西回家来，她的小孩就悄悄地跑出来帮她请客。机关里的同志都知道她这个脾气。有几个馋嘴的小青年，总爱有事无事地往她那里跑，他们说‘混饭票’，她呢，也不厌

烦。大家都敬重她。

“顶山城有一句俗话，叫作：‘好心不得好报，黄泥巴打不成好灶。’六二年，在顶山城买牙膏很困难，机关里也是按人供应。她们区里有个同志出差，家里一支牙膏怎么分？她把自己的一支牙膏送到火车站给了那个同志，她和孩子就用盐巴漱口。

‘四清’当中，那个同志提了她一条意见，说她用小恩小惠收买他。……”

“天底下什么人都有！”我忍不住插了一句。

“就是，不过总还是好人多。”

老严又点起一支烟，长长的吸了一口，把烟慢慢地吐了出来，说道：

“我挑两件我准备作为素材，写到我后面那个中篇里去的事情，说给你听吧。

“一件是我和玉丹的婚事，全靠她成全。我师范毕业的那年，岳母去世了。我接到玉芝的信赶回来，岳母已经安埋了。那时，玉丹已经初中毕业了，没有考上高中。镇上小学的杨校长，和我岳父是同窗，又同事了几十年，他把玉丹喊到他的学校去，当了教员，专门教音乐和体育课。镇上商会的刘会长，是个很霸道的家伙，他几次托杨校长做媒，要讨玉丹去做儿媳妇。我回来知道这事以后，很着急。我很喜欢玉丹，她活泼、天真。在当时，我们已经算是很开化的了，但比起现在那些‘现代化’的年轻人来，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了。心里明明爱，却偏偏要把这爱掩藏起来，生怕被别人看出来，不断的抬杠、吵嘴，表示自己没有私情。在知道刘会长托媒求婚的事情以后，我再也稳不住了。那几天，我真有点象热锅上的蚂蚁；玉丹也老是怨恨地看我。我没有亲人，自己又说不出口。回学校的头天晚上，我就鼓起勇气，把心事对玉芝讲了。我已经记不起我给玉芝讲了些什么话

了。话刚一出口，我就失悔了。因为岳母刚刚才去世，我就来说这些事情，不是很没有良心么？我怕玉芝会骂我一顿，吓得不敢看她。后来，玉芝答应了去问问玉丹，我的一颗心才落下去。

“玉丹答应了我。第二天，玉芝推托说她头痛，让玉丹一个人去送我上车。路上，玉丹问我：

“‘天天都在一起，你自己怎么不给我说？’

“玉丹的性格很开朗，很大方。我说：‘怎么好意思呢？’

“她说：‘你给姐姐说，怎么又好意思呢？’

“有时，我自己想起来也好生奇怪，为什么我和玉芝在一起的时候，感到要比和玉丹在一起的时候随便得多？就是我和玉丹结婚过后好多年，这种感觉也还有。我和我爱人的感情是很好的，但有许多话，我敢对玉芝讲，却不敢对玉丹讲。不愿对自己的爱人说的话，却愿对朋友说，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？我一直在想，但一直得不出结论来。感情这东西，真是千奇百怪，叫人捉摸不定。我记不准了，是爱因斯坦还是牛顿说的？他说：‘世界上最复杂的科学是数学。’我看，世界上最复杂的科学是人，是人学。……扯远了。

“我回到学校后不久，就收到玉芝的信。她的信上也没有说出了什么事，只是叫我立刻赶回去。我回来之后，她才把刘会长家几次托媒来求婚的事给我讲了。（在这以前，她连半点风声也没有给我透露过。）我离开杨花镇之后，刘会长又请了媒人来求婚。玉芝为了断了刘会长的念头，就公开了我和玉丹的婚事，说这桩婚事是我母亲临死之前就定下了的。玉芝还拿出我母亲生前经常戴在手上的那个玉镯子来作证。我母亲死后，我就把这玉镯子忘了，一直以为是母亲戴着进了棺材。这镯子怎么会在玉芝那里？我至今都还不明白。

“我和玉丹的婚事公开之后，刘会长并没有死心，他们暗中



从各个方面包围玉丹，软的硬的都有。玉丹在外面受了气，就回家来守着玉芝哭。玉芝也担心夜长梦多，写信把我喊回来，催着我们赶快把亲事办了。那时，也只有赶快成了亲，才能断了刘会长的念头。可是，那时我上无父母，下无兄弟姐妹，举目无亲，一个穷学生，拿什么彩礼玉成婚事？我除了干着急，什么办法都没有。有一天晚上，玉芝从洗衣店回来，背着玉丹悄悄的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老严突然顿了一下，赶忙把到了嘴边的话吞了回去。他凄苦地笑了一下，才解释说：

“我答应过玉芝，永远不再提起这件事，你看，我差点儿……你可别多心。”

人都有自己的秘密。我当然不好追问老严是什么事了，我只是问道：

“以后呢？”

我希望老严讲下去。

老严又作了一番解释，并且一再说，这件事他连对他爱人也没有说过；本来没什么了不起，再普通不过的一件小事，他只是不愿做丝毫对不起玉芝的事情，因为他向她保证过决不对任何一个人提起这件事，所以几十年中，他一直把这件事情压在心里，对谁也没有说过。一再表示歉意之后，老严才接着说了下去。

“后来，我和玉丹结了婚。我们结婚的那天，玉芝还在忙进忙出的为我们操办，可是，晚上她给我们留下了一张条子，天不亮就悄悄儿地走了。……”

我的心都收紧了，希望老严赶快说下去。可是，老严深深地叹了口气长气之后，摇摇头停下不说了。从神色上看得出来，他这时的心情很沉重。我没有问他，耐着性子等待着他的下文。我们又沉默着走了一里多路，老严才渐渐地平静下来，情绪低沉地说道：